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6.008

毛泽东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及其启示

龙其鑫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凝结而成的大家庭,而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毛泽东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要克服近代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残余,让各族人民培育共同的革命荣誉感与历史记忆;另一方面要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功能,以及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思考,为当代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之道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上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防止狭隘民族主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心防线,战略上要强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次认同,将提高“五个认同”贯彻落实到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

关键词:毛泽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6-0028-09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凝结而成的大家庭,而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国国家凝聚力的重要体现。作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一直致力于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为了唤醒全国民众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意识,毛泽东就大声呼吁“中华民族的大联合”^①。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鼓舞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泽东自豪宣示,“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②,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救亡图存的自信心和革命斗志。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通过指导党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让各族人民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的共

同体意识,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各种销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消极因素,主要包括:(1)民族分离主义。在帝国主义的教唆和挑拨下,一小撮人以“民族自决”为借口开展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否认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事实^③。(2)狭隘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者的挑拨离间,令中国各民族之间产生狭隘的民族对抗情绪,主要体现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④。(3)国家认同淡薄。中国各地方、各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对于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未能及时培育起来,尤其是封建主义上层分子“心在外国,不在中国”^⑤。(4)族际文化隔阂。多民族、多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但民族间文化差异难免导致一些文化隔阂,甚至是民族偏见的发生^⑥。

收稿日期:2021-05-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8JJD710007)

作者简介:龙其鑫(1988—),男,广东廉江人,博士,助理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

①《毛泽东新闻作品集》,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

③《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⑤《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以上四项构成了毛泽东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域。对于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进行了长期的思考,提出了一些具有创见的观点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指导方针。

一 克服近代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残余

近代以来,政治腐败与闭关锁国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停滞以及国力日益衰弱,从而诱使外敌乘虚入侵。内忧与外患,令中华民族出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辛亥革命前夕,一些汉族资产阶级革命人士将此归咎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宣称“五胡之乱,十六州之割,两河三镇之亡,国于吾中国者,外族专制之国,而非吾民族之国也”^①,从而片面鼓动“驱逐鞑虏”的狭隘民族主义。他们以为,若要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那就应建立单一的汉族国家。如邹容就主张,“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为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②。一些边疆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受到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加上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也一度导致“地方分离主义的浮现”^③。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所产生的狭隘民族主义加剧了近代中国民族矛盾,让帝国主义得以实施“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④,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领导新中国各族人民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残余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务必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肯定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

中国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持的中国国家与历史观念。毛泽东早在抗战时期就指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

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⑤,而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之中发现,只有在国家统一条件下,各族人民才能实现安居乐业,国家统一和民族交融始终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主流。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给人们讲述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⑥,通过赞颂“汉藏一家”来鼓励各民族加强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巩固对于自古以来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在毛泽东看来,“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⑦,保存与发扬各族人民彼此守望相助的历史记忆和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增进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实现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

(二)正确分析近代以来的民族矛盾,以促进民族团结

在毛泽东看来,正确处理民族矛盾,要以正确分析民族矛盾为前提。他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视角出发,结合近代以来中国民族问题实际,指出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才是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说道:“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⑧尽管大汉族主义是民族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才是其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其最主要代表则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⑨。也即是说,近代汉族人民群众和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一样都遭受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所以彼此有着共同的革命志向和根本利益。据此,毛泽东指出,新中国各族人民只有认识到“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⑩,才

①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②邹容:《革命军》,载张岱年、敏泽:《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一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③张宪文,张玉法:《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3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2页。

④《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页。

⑥盛巽昌:《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页。

⑨《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⑩《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能够实现民族和解,并且团结起来共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共同繁荣发展。

(三)辩证认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

“多元一体”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克服狭隘民族主义而逐渐形成的基本共识。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多元一体”的概念,但他常为人们讲解关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性及思想,例如:(1)在中华文化的形成上,历史上各族文化相互学习和借鉴,融合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具体如中国的传统音乐和乐器,“我们现在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①，“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②;(2)在中华民族的构成上,中国各民族之间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如“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③。归纳言之,在毛泽东看来,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因此新中国各民族和各族文化不应相互拒斥,而应该加强团结和交融。

(四)汉族作为主体民族,要自觉团结少数民族同胞

毛泽东指出,汉族作为大民族,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历史上曾对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统治,给中国民族关系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其中,国民党反动派鼓吹的“中华民族宗族论”就是大汉族主义的集中体现,他们通过将少数民族贬抑为“宗族”来剥夺少数民族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妄图以此来提高统治权力,却极大地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对此,毛泽东告诫指出,大汉族主义不仅不可能实现国家统一,而且往往是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的主要祸因。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时常叮嘱,广大汉族干部和群众一定要“克服大汉族主义”^④,特别是认识到“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⑤。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汉族才能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自觉和少数民族同胞搞好

关系而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综上所述,在毛泽东看来,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残余是新中国成立后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克服的首要问题,而正确分析民族矛盾产生的阶级压迫根源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前提,为各族人民确立共同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与和谐的民族关系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突破口;各民族劳动人民只有构建起守望相助的情感认同,才能从思想根源上杜绝狭隘民族主义的产生,从而牢牢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 让各族人民培育共同的革命荣誉感与历史记忆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同时也是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共同革命成果。在此意义上,各族人民对于新中国的认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内涵。毛泽东指出,让各族人民牢记共同革命的艰苦和光辉历程,特别是“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⑥,可以让各族人民培育共同的革命荣誉感和历史记忆,从而在深层的精神荣誉和记忆上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这些革命荣誉感和历史记忆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少数民族革命斗争是全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不可否认,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在革命斗争中付出了主要牺牲,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少数民族也作出了巨大的革命贡献。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组织了规模不一的抗日斗争运动,成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毛泽东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特别指出,中国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人民的英勇抗战离不开“各民族的合作”^①。到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和号召下,掀起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如“一九四四年被迫举义,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血腥军阀统治”的新疆“三区革命”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②。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三区革命,认为三区革命“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③,有力地钳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要求,广大汉族干部和群众应该正视少数民族同胞为人民民主革命付出的牺牲以及“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④的事实。在他看来,只有肯定少数民族对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贡献,才能够拉近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革命情感,并且培育起共同的历史荣誉感,从革命的历史和感情深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各民族革命力量汇聚起来是全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政治前提

毛泽东认为,由于同样遭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因而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有着共同的革命对象与目标。无论对于汉族抑或对于少数民族而言,二者都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本民族的解放只有建立在中华民族的共同解放之上才能够得以实现。因此,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⑤在这一政策及理念的鼓舞下,全国各民族革命力量逐渐汇聚起来,不仅为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也让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感受到民族团结的强大革命力量。在1949年全国政

协会议上,赛福鼎·艾则孜作为维吾尔族干部代表发表感言指出:“全新疆人民经过了长期的武装与和平的斗争,已清楚地了解了新疆人民的解放,一定要和全国人民解放同时解决,所以一直拥护和期待着全国的胜利解放。”^⑥而乌兰夫作为蒙古族干部代表也深情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始至终是内蒙古各民族人民最好的朋友和领导者。他们承认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并给各民族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就是中国各民族必须团结共求解放。”^⑦

(三)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成为各族人民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基本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此意义上,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都参与了新中国的成立,从而在1951年《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⑧。接下来,为了鼓励少数民族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中来,同时也为了教育汉族人民,毛泽东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更加深刻地指出,新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有家园,而新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离不开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团结友爱,而这特别要认识到“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⑨。在毛泽东的思想指导和党的宣传教育下,新中国少数民族确立起了前所未有的国家主人翁意识,而汉族也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和自己一样都参与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只有确立起空前平等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及

①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摘录)》,载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93页。

②《新疆自治运动扩至天山南麓 步骑数千已成立统一组织 活跃吐鲁番盆地打击蒋匪》,《人民日报》1947年11月27日。

③毛泽东:《关于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问题》,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页。

⑥《人民政协新疆代表谈新疆人民的解放》,《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

⑦内蒙古乌兰夫研究会:《乌兰夫论民族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意识,培育共同的革命和历史荣誉感,才能使新中国作为各族人民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也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三 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功能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制度创新。对此,毛泽东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够成为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由中国基本国情决定的。而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可以实现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而且能够维护新中国国家统一。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推行与发展过程中,维护国家统一和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应该始终发挥范导性的政治原则作用,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功能,而这一制度功能又由以下政治理念所支持着。

(一) 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由中国各民族交融统一的历史主流以及多民族杂居和交错聚居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一直以来,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相互交融的统一历程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但这一历史进程离不开各少数民族的支持与参与,如蒙古族、满族就为中国国家统一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①。因此,中国历史主流是国家的统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维系,这从客观上决定了新中国务必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不能照搬苏联的联邦制模式——在边疆民族地区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为了加深人们的理解,他又通过比较中苏两国的基本国情指出,“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且分布集中,对比起来,“我们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六”且呈现多民族杂居和交错聚居的分布格局,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

这是不对的”^②。

(二) 成立一个民族的自治区并冠以该民族的名称,是要让该民族实现当家作主的同时肩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责任

新中国初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际,一度有观点认为,成立某个民族的自治区以及在该自治区上冠以该民族的名称就意味着该民族自治区是该民族的专属地区,或者该民族在其自治区内享有比其他民族更多的权益。为此,毛泽东通过示范性指导,对这一错误观点进行了纠正。以1955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其名称的择取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示范性意义,因而新疆各族干部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电请示意见^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复电指出,维吾尔族是新疆地区的主体民族,自治区应冠以“维吾尔”的名称,这是维吾尔族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但同时强调,与汉族作为全国主体民族而团结帮助各少数民族同胞一样,“维吾尔族是新疆地区的大民族,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应该更加注意照顾其他少数民族,以利进一步增强新疆各民族的团结,进一步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④。通过对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示范性指导,毛泽东为人们指出,成立一个民族的自治区并冠以该民族的名称,一方面是让该民族实现当家作主,另一方面是让其自觉肩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责任。在新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赛福鼎·艾则孜作为维吾尔族干部代表向全国、全疆各族代表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维吾尔族干部和维吾尔族人民必须加强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团结,特别是要充分照顾人口比较少的散居的民族的实际利益和保障他们的平等权利,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维吾尔族干部必须向汉族干部学习”^⑤,以实际行动响应与贯彻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及政策。

①盛巽昌:《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331、38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58页。

③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④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⑤赛福鼎·艾则孜:《新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词》,载余俊升:《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新疆的胜利》,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三)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要继承和发扬各族人民互助合作、互相来往的历史传统,而不是制造或加大族际罅隙

随着新中国初期各自治区的成立,又有一些观点认为,成立自治区意味着该自治区在政治和行政上可以“独立自主”,而且在各项事务上突出了族际差别,特别是突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差别。对于这一观点,毛泽东批评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系到少数民族的当家作主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并非单个民族的事情,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事,因而各族人民要继承和发扬互助合作、互相来往的历史传统,而不应发展孤立主义和制造族际罅隙。1955年10月,他在接见西藏人士时就指出:“各民族要互相来往。你们明年四五月成立自治区筹委会的时候,也可以邀请各民族的代表,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壮族、苗族、彝族,青海的藏人、四川的藏人等,请几十个人到拉萨看一看。”^①

为了促进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实行与发展民族区域自治上实现团结合作,毛泽东又提出了两项工作指导。第一,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要以身作则,促进民族团结交融。“民族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②,中央和各民族地区要大力创办民族院校,促进“干部的民族化”,并支持和鼓励少数民族干部到内地去参访学习。与之相应,少数民族干部也要欢迎汉族干部到民族地区去参加建设,因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③,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要为各民族的团结交融作优秀示范。第二,让各民族自治区融入全国社会发展中去,共享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成果。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地区整体上落后于汉族地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中央政府应鼓励各民族自治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全国社会发展中去,以共享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成果,“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

希望的”^④。这是帮助少数民族进一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的根本方法。

以上是毛泽东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提出的政策理念,而为了使这些理念能够有效地贯彻落实开来,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年里,他就多次指示中央政府派出代表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访问工作,以监督落实民族政策^⑤。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坚持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功能,让各少数民族群众深切体会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培育起对于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制度认同和制度自信,从而才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政治制度基础。

四 坚持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及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毛泽东认识到,中华民族要实现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就必须凝聚起全民族共同斗争的精神意志。而历史和实践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仅实现不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也难以将全国各地和各族人民凝聚起来。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⑥在他看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所在。

(一) 社会主义事业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新中国初期,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毛泽东认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⑦,因而从195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应逐步开展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关乎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能排除在外,“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

①《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⑤汪锋:《我国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载《十年民族工作成就1949—1959(上)》,民族出版社1960年版,第14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据此,他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①。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汉族亦或少数民族,都应该携起手来互相支持,“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②,争取实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伟大复兴。

(二)肯定和发挥少数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性作用

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整体上落后于汉族和汉族地区,从而导致一些汉族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轻视少数民族以及“包办代替”的现象。为此,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明确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工作方式,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③。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尊重少数民族的主体性,才能调动少数民族发展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各地少数民族群众掀起发展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非常好的证明。为此,毛泽东将各地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发展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案例收入其主持汇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之中,并为此作按语指出:“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经办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几个族的人民联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绩很好,这就驳斥了那些对于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④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不能因为少数民族的暂时落后而将其排除在外,只有帮助和鼓励少数民族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作用,才能真正做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这

是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工作方法。

(三)发展“民族联合”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一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一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⑤基于这一理念,毛泽东认为,让各族人民组织起来开展社会主义改革,构建各民族根本利益一致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最主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观察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许多民族联合起来成立了“多民族联社”,通过各民族分工、分业合作的方式大大促进了农牧业的生产发展,而且开创性地推进了民族团结交融。为此,毛泽东在其主持汇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几个民族联合起来创办农牧业合作社的积极现象给予了高度评价^⑥。而在他的指示下,中国共产党在1955年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肯定和支持“在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可以组织单一民族的合作社,或者是民族联合的合作社”^⑦。自此,全国各地的多民族联社逐渐推行开来,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也迈进了新的发展阶段^⑧。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是抽象的理论论证,而必须落实到实践中来;各族人民只有通过开展“民族联合”的生产实践,才能发生真真切切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而让彼此的感情升华起来,而由此升华出来的族际感情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和核心所在。

(四)推动各族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毛泽东指出,文化落后与发展不平衡是新中国初期各民族的基本状况,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才能改变各民族落后的文化面貌,到那时“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④《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

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93页。

⑦《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420页。

⑧《近三千万少数民族沿着合作化道路,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迈进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7月9日。

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①。新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必须实现“推陈出新”,如此就务必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要开“香花”而不是“毒草”,其判断的首要标准就是“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②。归纳言之,只有经过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才能摆脱落后的经济与文化困境,并以团结和进步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面貌展示出来。1956年8月,毛泽东对各族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革进行总结指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③在毛泽东看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经过社会主义改革,不仅能够实现空前的团结交融,而且将改变落后的经济文化面貌,从而极大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而这一文化自信也将让各族人民更加坚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五 当代启示

毛泽东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为中国各族人民改变一盘散沙、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以及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战略性的思想指导。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坚决反对民族分离主义,努力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残余,从而培育起了高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对新中国形成了空前的国家认同。这让中外人士惊讶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同时,还看到了空前团结和焕然一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正如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所指出的,“对于20世纪中叶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主要功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个国家的幅员和多样性与整个欧洲相当,但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像一盘散沙,如孙中山哀叹的——以致许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而为一了”,但毛泽东成功统一了中国,并且“毛泽东领导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④。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和民族关系发展总体趋好,但仍面临着一定的挑战,而国外敌对势力也没有放弃对我国民族关系的挑拨。就此而言,毛泽东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仍然可以为当前民族工作提供许多重要的思想启示。

首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之道。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其对中国国家、社会和民族共同体的整合,切中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国家统一信念。诚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改变了近代以来四分五裂与一盘散沙的历史命运,“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就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成就——也就是重新统一——十分相似”^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开辟了更为光明的路程。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才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道路、制度和文化支持。

其次,更好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功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提出和实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制度创新,并且成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当前,贬抑或主张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声音此起彼伏,给各族人民带来了一定的思想困扰。但毛泽东早已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发挥了其维护国家统一和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功能,而这也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⑥。因此,新时代应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好地发挥其维护国家统一和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功能,以提高各族人民对于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自信,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政治制度认同基础。

再次,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将中华民族共同体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④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7页。

⑤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谢亮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页。

的人心防线筑牢。近代以来,狭隘民族主义一直扮演着危害各民族和平共处与各国国家统一的消极角色,其激化形态——种族主义更是催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种族冲突、屠杀和清洗。鉴于此,毛泽东才一直告诫,各族人民在交往过程中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不仅反对大汉族主义,而且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各民族进入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各民族的相互接触和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因此,新时代做好民族关系的协调工作愈来愈重要,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防止狭隘民族主义的产生和激化,而着力点在于做好“争取人心”的工作,特别是让各民族在相互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做到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引导各族人民正确分析和解决民族问题。只有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心防线筑得牢牢的,各族人民才能防止狭隘民族主义的产生和激化,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才能筑得牢牢的。

最后,在战略高度上构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次认同。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能够始终维

系如一和生生不息的深层次因素,而认同的失序往往直接危及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甚者导致政权倾覆和国家分裂。鉴于认同失序带来的危害,毛泽东曾经叮嘱:“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①随着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发展,认同问题日益突出,一些霸权主义国家常常利用或制造认同问题去干涉他国内政,以此分化、分裂他国^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③,而新时代民族工作务必实行新的战略部署——即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④。上述“五个认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素,只有将提高“五个认同”落实到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才能牢牢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维护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安全,为更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Mao Zedong's Thinking and Inspirations on Forging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LONG Qi-xi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the big famil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stitute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o Zedong proposed that we must overcome the remnants of modern narrow nationalism, cultivate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honor and memory shared by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addition, we should give play to the institutional function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to safeguard national unity and follow the socialist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Chinese nation. Mao Zedong's thinking has provided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temporary ethnic work. The fundamental way to foster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s to persist in developing socialism. Politically, we must adhere to the system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We must guard against narrow nationalism to build a solid line of defens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Strategically, we must construct a deep cultural ident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e will implement the “five identities” in all aspects of national affairs and social life.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unity; the socialism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页。

②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340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3页。